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明代的科举与经学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FIVE CLASSICS IN MING DYNASTY

—
陈时龙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明代的科举与经学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FIVE CLASSICS IN MING DYNASTY

陈时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的科举与经学 / 陈时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203 - 2219 - 5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明代②经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D691. 348
②Z126. 274.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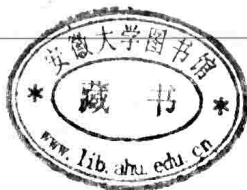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268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25
插 页 2
字 数 452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明代科举与明代经学研究的新进展

卜宪群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自汉代察举到隋唐科举是一个最重大的变化。科举制度克服了以往选官散漫主观、重视门第的弊端，以相对公平的考试作为选拔官员的方式方法，为宋代以降的社会政治流动创造了条件。科举制度确定了考试为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此后历代的变化就主要体现在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规定上了。就考试内容来说，历代有时候重经学，有时候重视文才（诗赋）。当然，以五经、九经或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学经典，自汉代以来就已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而科举考试服务于王朝统治，为统治者选拔人才，就不可能离开经学。唐代科举虽然重诗赋，但明经仍然是基础，而且进士科也要考帖经，即要求考生对经学必须有最基础的掌握。宋代的科举考试中，经义、诗赋之争始终存在，不过王安石所开创的经义取士的考试之法对于后世影响深远。在元明清三代大部分时间中，经义取士始终是科举考试的主流，如明代的经义取士即体现为科举考试重视首场五经义、《四书》义。因此，科举考试与经学的关系始终密切，对于从王朝建立初期到末年一直相对稳定地、规范地重视以经取士的明代而言，尤其如此。

长期以来，研究明代科举的论著很多，研究明代经学的论著也不少，却很少有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研究。原因或许很简单，研究经学的学者很少把为科举服务的经义视为经学主流成果，而研究科举的学者则认为经学不过是科举敲门砖而已。可能在他们的理解中，科举与经学不过是因为朝廷政策而肤浅地结合到一起了。然而《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一书却有更独特的视角。作者把科举考试、经学教育、地域社会、家庭与家族、士人的治学取向联系到了一起，从而使这项研究不仅有科举史、学术史的价值，更有社会史的意义。作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从他提到的一个有趣概念——“地域专经”说起。作者在书的开篇就对这一概念作了阐释，指出所谓的地域专经，是指在明代一经取士的科举

体制之下，某些地域的士人相对集中地选择五经中的一门经典作为自己应考的本经来应考的科举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明代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从 15 至 17 世纪，至少非常兴盛地存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当然，这一现象不是作者最早发现的。例如，日本学者鹤成久章较早就谈到浙江余姚的士人们在科举考试中擅长《礼记》，张艺曦等学者也曾在各自的研究中提到过江西安福县的士子专经于《春秋》，以及湖广黄冈的士子专注于《礼记》那样的事实，钱茂伟对宁波杨氏家族的研究也发现宁波鄞县的士人专注于《易》。但是，对这种一个地域专于一门经典的科举文化现象予以重视，进行普遍的、长时段的考察，并对其生成、变化、终结的历史予以系统梳理，作者是第一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明代科举的“地域专经”的概念。这本书不是要泛泛地探讨明代所有与科举和经学有关的问题，而是聚焦于科举中“地域专经”的问题。

就历史学而言，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一般来说是学者在精心读书的过程中产生的。照作者所说，他很久以前就已经关注明代科举考试中地域专经的问题，起因就是 2003 年读到明人黄景昉《国史唯疑》中的一段话，其中“安福《春秋》、黄冈《礼记》”一语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了缓慢的学术追踪，并且静静地等待更方便的机会的出现，即珍藏于天一阁大量明代科举录的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中国科举录汇编》等资料的陆续影印出版，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素材，将“地域专经”的印象通过数据统计进一步落实。作者进而广泛深入挖掘明人文集、地方志中的线索，不仅以此进一步丰富数据统计所得到的结果，而且让我们对这种现象的观感更生动，也更动态。作者在 2012 年完成《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以江西安福县的〈春秋〉经为例》一文，刊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揭示明代科举的地域专经现象如何形成、发展、变化、终结，可以说对相关研究有范式性的贡献。2013 年，作者以“明代科举体制下的经学与地域研究”为题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本书实际上正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结项成果。书中除了对安福《春秋》的研究外，还包括黄冈《礼记》、麻城《春秋》、无锡《尚书》、余姚的《易》和《礼记》等个案研究。如何选择这些个案，作者在他的导言中也有说明。可贵的是，这些个案研究不仅利用科举录资料、文集和地方志，还使用了不少族谱材料与地方文献，从而使其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更贴近底层，也有地域特点，因此也更有说服力。个案研究之外，作者在最后回应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地域专经的现象不能一直延续下去？与科举考试相关的经义是经

学吗？他认为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经学资源因为人员、书籍的流动等各种因素最终会在地域之间达成平衡，从而使“专”者不再专，而不“专”者可以渐专，进而使地域专经现象最终在17世纪衰微。这种转变不完全是制度变化或王朝易代的结果，而是社会的力量使然。例如，携带着技术和市场强大影响力的晚明出版业，就正是这样一种难以抗拒的社会力量。作者对那些与科举相关的经义——也即他称之为科举化经学——的评价，也是值得重视的。科举化的经学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基于前代经学传统之上，而且其治经之法虽未必能被清代的考据学者重视，但在明代却恰恰占据主流。从经学史的观点而不是清儒的偏见来看，一代自有一代之经学，明代的科举化经学恰恰是明代经学的主流。我想，这样的评判，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明代经学的“积衰时代”的讲法是有意义的。作者在2016年按计划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后来的结项鉴定为优秀，也说明评审专家们对作者研究的肯定。2017年，作者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库的资助出版，这才有了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我不懂明史，但我很认同作者的研究思路。作者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出发，进而寻找普遍联系，最后能够从中提炼出某个核心概念，体现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样的研究对推进学科前进和学科建设是有益的。

再有一点感慨，是为历史学研究者的艰辛和坚持而发。作者从2003年开始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到撰写代表性论文，再到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其间前后经过了十余年的时间。但是，我也欣赏这种研究的路径。对于一个年青的历史学研究者来说，在日常的读书学习中培养自己对问题的敏感度，积累下一些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却又不追求短平快地写作与发表，而是耐住寂寞，长期追踪，在条件成熟后再以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完成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想来这一过程中，新的发现所带来的欣喜，总是能消除我们的疲惫，鼓励研究者不断地励志前行。

我与时龙同志较熟悉，他是一位非常勤奋刻苦又善于思考的优秀青年，淡薄名利，在历史所潜心做学问，在一个一个问题上循序渐进，收获颇丰。他很早和我谈过这个课题，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研究问题，一再给予积极鼓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今天，这本著作即将付梓，我内心非常高兴，嘱我写几句话，是为序。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节 问题与概念	(1)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	(13)
第三节 资料与方法	(23)
第一章 地域专经之形成	(33)
第一节 唐以来的科举与经学	(33)
第二节 明代科举之一经取士	(44)
第三节 本经之择与邻近趋同	(54)
第四节 地域专经形成与演变	(67)
第二章 地域专经的分布	(76)
第一节 明代科举中的《易》	(77)
第二节 明代科举中的《诗》	(87)
第三节 明代科举中的《尚书》	(92)
第四节 明代科举中的《春秋》	(98)
第五节 明代科举中的《礼记》	(109)
第三章 安福《春秋》	(116)
第一节 科举录中的安福《春秋》	(118)
第二节 安福《春秋》学的源流	(124)
第三节 安福《春秋》经与家族	(131)
第四节 婚姻、师承与交流圈	(139)
第五节 安福《春秋》的终结	(149)

附录：一经之传及其演变	
——明清安福县邹守益后裔的家学与科举	(156)
第四章 黄冈《礼记》与麻城《春秋》	(168)
第一节 黄冈之“生而好《礼》”	(171)
第二节 麻城之“《春秋》世业”	(180)
第三节 光、黄一带对孤经的肄习	(195)
第五章 余姚的《礼记》与《易》	(202)
第一节 烛湖孙氏家学的演变	(204)
第二节 余姚士人本经之变化	(210)
第三节 专经《礼记》的家族	(218)
第四节 余姚的《易经》名家	(226)
第六章 无锡《尚书》	(232)
第一节 无锡《尚书》经传统的形成	(234)
第二节 经师代起与《尚书》的传递	(241)
第三节 家学与《尚书》经传统维系	(251)
第四节 坚守或风从：华氏家学的个案	(264)
第七章 “毋自私”：传播视野下的地域专经	(272)
第一节 宦游与移民	(272)
第二节 游学与教馆	(291)
第三节 出版的影响	(301)
第八章 “亦一径也”：经学史视野下的科举化经学	(317)
第一节 对明代科举化经学弊端的认识	(318)
第二节 明代科举化经学是对宋元经学的继承	(326)
第三节 科举化经学著作是另类的治经成果	(333)
附录表格	(346)
参考文献	(375)
后记	(406)

导 言

第一节 问题与概念

科举制度从形成的那天起，就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而且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结构紧密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从科举制度在唐代正式形成，到清末 1905 年废除科举，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逐渐成为人才选拔的最重要途径。明代文学家茅坤（1512—1601）说：“隋唐以来，其所取士之法惟制科，则世之倜傥卓犖之材，非历制科，无由以进。”^①

对于明代社会而言，科举同样是一项重大问题。其一，在明代，科举是绝大部分人进入政治仕途的必由之路。朱元璋最早设科取士的理想目标，就是“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毋得与官”^②。虽然此后朱元璋一度废科举，但三途并用一直是明代入仕的特点，而科举在明代仍是主流。明代著名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说得很清楚：“夫自我国家以科目选士，士生此时，即行若由、鱼，才怀管、箫，非是亦无繇以进。顾一切皆限以科条矩矱，虽绝材奔骝，亦必俯首屈就。……士路一切网于科第。”^③其二，科举是明代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在明清时代培植了有一个相当人数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士绅阶层。其三，明代的科举考试较前代更制度化、更标准和规范。除明初短暂的时间和少数特殊情况外，三年一次的乡试与会试极其规范地举行。科举越制度化，对当时社会的影

^①（明）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十七《饥豹存稿后序》，《茅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56 页。

^②（明）朱元璋：《孝陵诏敕·开科取士诏》，《明朝开国文献》，台北学生书局 1966 年版，第 1863 页。

^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九《襄阳府科第题名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8—119 页。



响越持续而稳定，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越深刻。其四，从社会影响的广度看，除极少部分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外，绝大多数人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张居正说：“我国家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苇布闾巷之士，化为望族。”^① 王世懋（1536—1588）则说：“国家用经术取士，士多从白屋致公卿将相。”^②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给整个社会以巨大的希望，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即便一个人未能最终通过科举考试，而作为读书人从事科举还是会为他赢得一定的社会资本。魏希德在讨论宋代科举时说，“尽管士人了解登科人数有限，通过初级考试的机会也越来越小，他们还是继续投入到举业之中。参与不代表成功，登科也不代表入职政府，但是参与本身就能产生社会资本，这种资本在地方上可以带来权力与名声”^③。在明代，士人参与科举，获得的社会资本更优厚，而士人对科举的参与热情也更高。正如卜正民所说，“来自考试体系的功名不仅是进入政府供职的入场券，而且也是在地方的关键资源”^④，功名不仅可能带来官位，更切实的是带来经济方面的特权与士绅的地位。

科举在明代社会总体而言是相对公平和开放的。洪武三年（1370）五月初一的《开科取士诏》中规定除了已经入仕者和“有过罢闲人吏、娼优之人”以外，“其余各色人民并流寓各处者一体应试”^⑤。明人刘大夏（1436—1516）说：“我朝设文举以求士。诚足以备一代之彝典。而其网罗之周密，自闾阎以及草泽，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⑥ 人们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命运，而且一旦登科其入仕的概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在明代，即便人们通过科举改变身份的概率不大，然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们仍然对科举制抱以极大的热情，科举考试在日常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形成了“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的社会，而“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⑦。即便

①（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八《西陵何氏族谱序》，第110页。

②（明）王世懋：《王奉常集》文部卷十五《詹事王公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影明万历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5页。

③【荷】魏希德著：《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胡永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6页。

④【加】卜正民：《家族承继性与文化霸权——1368—1911年的宁波士绅》，载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⑤（明）朱元璋：《孝陵诏敕·开科取士诏》，《明朝开国文献》，第1868页。

⑥（明）刘大夏：《请开武举疏》，《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9页。

⑦ 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社会》2006年第6期。

在明初荐举、学校尚是重要的任官途径时，从洪武三年王祎所拟《开科举诏》中“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①一语，还是能看到明初统治集团亦认为最理想的选官途径还是科举考试。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科举几乎是唯一的荣身之阶，舍此而别无他途，对社会的影响力与整合力巨大。因此，大部分家庭都会选择不遗余力地教子读书以业科举，而科举考试和功名也就成为明人始终关注的“热点”，围绕科举考试的各种传说、故事以及神秘性的渲染也层出不穷。^② 晚明嘉定名士李流芳（1575—1629）说：“今士非科举之业不足以致身。至于父母之所以教子，与子之所效于父母者，终其身以名相笼而不既其实，以即至于自失而不悔。”^③ 明清时代的人对科举几近百分之百地投入，虽有怨而无悔。清初严绳孙在编纂《无锡县志》时说：“近代荣进之途既一，父兄之所以望其子弟，与学者之所自期，必于是焉。”^④ 郑振铎先生也感慨封建时代的父母伯叔常要教导孩子们说：“要勤读，要勤读，经书不熟，将来要没有饭吃呢。”^⑤ 因此，科举是包括明代社会在内的封建晚期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也正因为科举是明清社会整合的核心，其涉及的问题颇为复杂，与科举相关联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成为一个大议题。笔者此处要关注的，是明代科举制度下地域与经学之间的关联。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读到明末大学士黄景昉（1596—1662）《国史唯疑》中的一段话。他在书中说：“安福《春秋》学，始刘球、吴节二公，后进竞师之，遂以其经名天下，迄今有安福《春秋》、黄冈《礼记》之目。”^⑥ 这大概是黄景昉在阅读《明实录》吴节小传后写下的一段议论。安福县属吉安府，学界熟知其乃是明代江右王门的重镇，有邹守益、刘邦采、刘文敏等王阳明门人，但对于其《春秋》学的认知却不广泛。当然，地域与学术间关系的表述，不是一个新问题，之前许多关于地域学术或地域文化的讨论中，大到讨论一个流

①（明）王祎：《王忠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7页。

② 参见汪维真《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第22—28页。

③（明）李流芳：《李流芳集》卷七《寿汪母谢太夫人七十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④（清）徐永言、严绳孙、秦松龄纂：（康熙）《无锡县志》卷十二《进士》，《无锡文库》第一辑影康熙二十九年刻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⑤ 郑振铎：《经书的效用》，载《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下册第1211页。

⑥（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域、一个省、一个府，细至讨论一个村落、一个家族，相关的论述不少。那么，对于“安福《春秋》”“黄冈《礼记》”这样的就县一级的中层地域的学术概括，究竟有何意义？当然，首先要确证的是，黄景昉的表述是否符合史实？如果是，那么安福士子多治《春秋》、黄冈士子多治《礼记》这样的经学选择又是如何形成的？显然，仅从经学史的视野来看，无论是“安福《春秋》”，还是“黄冈《礼记》”，都不可能在我们的经学史中留下任何印记。那么，这样的表述又是自何种意义而言呢？初步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表述是以科举为背景的。明代实行一经取士的科举政策，士子在科举考试中只需要选择一种经典来应考。“安福《春秋》”就意味着安福县的士子多选择《春秋》经来参加科举考试，而“黄冈《礼记》”则意味着黄冈县的士子多选择《礼记》经来参加科举考试。这样的一种经学选择超越了简单的地域学术取向，而更须引入科举考试的因素，实质是科举体制下的经学与地域关系的问题。因此，问题随即由地域与学术二者之间的关系演变成科举、地域、经学三者间的关系。

伴随而来的问题是：像“安福《春秋》”“黄冈《礼记》”这样的现象，是个别的、特殊的，还是普遍的、一般的？如果是普遍的，那又是如何形成和维持的？又是如何适应科举考试的政策演变而演变的？这样的现象，反过来对于科举考试的政策设计和调整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地域的划定是相对的，而一个具体的地域也不会是永远封闭的，在明代尤其在晚明那样一个极富流动性的社会更是如此。地域专经强调的是地域差异性，却也不忽视地域之间的交流与趋同，而人员和物的流动，尤其是出版物的流动使这种交流极为频繁和密切。因此，我们不得不再问，地域专经这样的现象在明代科举史上持续了多久？地域专经的科举文化是否延续到了清代？怎么从经学史的视野来理解这种现象？

在试图分析和解决以上的问题之前，首先要对此项研究所涉及的几个概念做简单的说明。一是“专经”的概念。“专经”又可称“本经”，此处专指明代士子参加乡试和会试等科举考试时，自五经中自己选一种将要考试、答题的经典，即其“专经”或“本经”。“专经”或“本经”的名词，是早于明代就已经出现了的。《中国科举辞典》释“专经”云：“古代读书者在《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中，自行选定一经，作为本人专门研习，一般称为‘专经’。按规定凡应乡试、会试者必须在卷面上注明所习专经。”对于“本经”，《中国科举辞典》的解释稍显复杂：“贡举考试名。宋代儒家经典《周易》、《诗经》、《尚书》、《周礼》、《春秋左传》的统称。元祐四年，始于进士科置诗赋、经义两科，

凡诗赋进士须于本经中自选一经研习。初试即本经义二道。”^①《中国科举辞典》没有进一步说明，对于明代及清前期的科举考试而言，“专经”与“本经”其实没有差别，而“本经”使用得可能更多。似乎自有科举以来，“专经”的倾向便出现了。元末明初的学者林弼（1325—1381）说：“汉置五经博士，唐以还士用明经荐，由是学者尚专门之业，有能博求其师而兼通数经者，未始数数也。”^②当然，专经的形成是从宋代经义考试开始的，并且在元明两代制度化。具体而言，明代科举考试要求学生们在考试的第一场考《四书》和五经，《四书》的三道题是必考的，但五经每一经都有四道题，考生却只需要选择一经作答，或《易》，或《诗》，或《尚书》，或《春秋》，或《礼记》。若是考生要将五经的所有题目都作答的话，反而是违制，其录取与否必须专门请旨。显然，一般情况下考生不会去冒这个险，只是在晚明经学复兴的大背景下，一些考生炫其博通，五经一概作答，而天启、崇祯两朝皇帝亦因势利导，鼓励考生们博通五经，才有以五经中第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一经中第才是明代科举的常态。在一经取士的政策下，学生所选择的用以应对科举考试的经典，即他的本经或专经。

本经由考生自己申报，但本经存在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从小到大只能学一种经典。士子从开始读书启蒙，到选择一门经典作为主攻方向，再到选择本经参加科举考试，中间可能会有许多改易。例如，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人郭锦（1484—1540），字尚纲，出身商人家庭，习贾不成，改业儒，“负篋徒步从师受《易》，又受《春秋》，已又受《尚书》，精于《尚书》”^③。福建同安人林一材（1533—1611，1571年进士），“幼聪敏，从师受羲经（指《周易》），稍长，乃改治《春秋》”^④，最后以《春秋》中进士。可见，在找到一门自己有兴趣或者有心得的经典之前，学子可以转益多师并尝试多种经典。郭锦学《尚书》有成，又以《尚书》经教子，其子郭希颜后以《尚书》中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找到了一

^① 翟国璋：《中国科举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9页。

^② （明）林弼：《林登州集》卷二十《逸士蔡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0页。

^③ （明）严嵩：《钤山堂集》卷三十一《明故封翰林院检讨郭君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影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增修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62页。

^④ （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四《山西参政祀乡贤林玉吾暨配封宜人九十六寿慈安叶氏墓志铭》，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3页；《隆庆五年会试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本，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下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多出《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不赘注版本。

门适合自己家庭的本经。而且，一位士子选择何种经典作为本经纯属自愿，从小到大可能会治多种经典，也可以精通数种经典，并不存在选定一种经典就须一辈习一种经的规定。山西朝邑人韩邦奇（1479—1555）即谈到同邑的一位生员赵天秩“博通五经子史诸大家文章，而《周易》、《尚书》两经能为举子业，尤精《易》占”^①。李东阳谈到苏州吴县人朱文“少入府学为诸生，有名，初业《诗》，旋改《春秋》，再改《易》”，后中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②王鏊（1450—1524）谈到浙江上虞人陈大经（1490年进士）“初习《礼》，已而旁通诸经，以《诗》占淞江解试”^③。浙江永嘉人王激初以《春秋》中正德二年（1507）浙江乡试，后又以《诗经》登嘉靖二年（1523）姚涑榜进士。^④南大吉（1487—1541）“承庭训，既熟小戴《礼》矣，又学《易》于荣昌冷氏，又学《礼》于常邓州赐，遂通二经”^⑤。南直隶昆山人朱文（1444—1511）“初治《诗》，已乃改治《春秋》，又改治《易》，治《易》未三年，遂登第”^⑥，中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江西余干人叶博（1537—1609），字子约，“始学《书》，改学《诗》，兼治《春秋》，薄所为时文举子业，日取六经性理及诸名贤语录、历代礼乐、兵农、河渠之书精究其义”，最后弃青衿而讲胡居仁之学于乡。^⑦明代著名的经学家郝敬，自启蒙受学以来，陆续学过《诗》、《易》和《春秋》等数经。^⑧而且，越到晚期，士人日益意识到专习一经之陋，故而往往兼习数经。蒲州人韩楫（1531—1608）“通《易》、《诗》、《书》、《礼》、《春秋》五经，以《礼记》举于乡，以《春秋》中会试第四人”^⑨。沈鲤也记载他的这位同年进士

①（明）韩邦奇：《苑洛集》卷六《茂才赵生仲礼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3页。

②（明）李东阳：《李东阳续集》文续稿卷七《明故中宪大夫云南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君墓碑铭》，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24页。

③（明）王鏊：《震泽先生集》卷二十七《知将乐县陈君墓志铭》，《王鏊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页。

④（明）王叔杲：《半山藏稿》卷十五《家传》，《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集部第11册影明万历刻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9年版，第199页。

⑤（明）马理：《明故中顺大夫浙江绍兴府知府瑞泉南先生墓表》，《南大吉集·瑞泉南伯子集》卷二十二附录，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

⑥（明）王鏊：《震泽先生集》卷二十九《中宪大夫云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志铭》，《王鏊集》，第405页。

⑦（明）叶应震：《叶梧叟先生集》，《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4册影清乾隆二十八年梧冈精舍刻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⑧ 蒋秋华：《郝敬的诗经学》，《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二期（1998年3月），第256页。

⑨（明）李腾芳：《李湘洲集》卷四《右通政韩公墓表》，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26页。

韩楫“五易师，各治一经。……嘉靖壬子，以《礼经》膺乡荐”^①。

从考试的要求来说，士子是可以改易本经的，乡试的本经与会试的本经也尽可不同。嘉靖年间著名的学者马理（1474—1555），其父亲精通《易》和《礼记》，但马理却“以胡氏《春秋》擢举人魁第，……又以朱氏《诗》擢进士”，故能涉猎数经。^②李开先也说马理“年二十五以《春秋》魁乡试，四十一始以《毛诗》魁南宫”^③。检明代科举录，《弘治十一年陕西乡试录》记载：“第四名，马理，三原县学生，《春秋》。”《正德九年会试录》记载：“第九名，马理，陕西三原县人，监生，《诗》。”^④可见，马理不但是乡试《春秋》经魁，会试中改易《诗》为本经，在以《诗》为本经的考生中位列第三名，不仅在乡会试之间改易本经，而且在不同的本经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故而著有《周易赞义》《尚书疏义》《诗经册义》《周礼注解》《春秋修义》诸书，^⑤可谓遍注五经。河南内黄县人刘某，字伯延，别号胤从，“万历癸酉以《诗经》举京兆试，三上南宫，乃改治《春秋》，仍旁精《左氏》《公》《谷》家言，著笔益闳肆，丙戌……果隽”^⑥。刘伯延会试三次不中后，改变本经，以孤经《春秋》会试中式。到晚明，因为科举的通道越来越窄，读书人也更多地想通过变易本经来试试运气。谭元春（1586—1637）自述其家父子兄弟的本经数变：“予家世学《易》。先人蚤岁为诸生，怯其难，徙而治《尚书》，因课予兄弟《尚书》，惟弟服膺一人中道徙去，去学《诗》三百六篇。”^⑦在明人学习或考试的历程中，改易本经的相关例证还很多。王红春就提及万历年间举人张世伟初学《春秋》而后改业《诗》，其友人陈芝房亦因此也将本经由《春秋》改易为《诗》，最终皆以《诗》获举；何景明幼年先因受临洮府知府赏识而从其受《春秋》，归乡后仍随其兄何景韶学《尚书》，并最将以《尚书》经在科举中获隽；李贽则为科举先后治《易》《礼》

①（明）沈鲤：《亦玉堂稿》卷十《明中议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元泽韩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1—342页。

②（明）南大吉：《瑞泉南伯子集》卷二十《明诰赠中大夫光禄寺卿云岩马先生墓碑》，《南大吉集》，第94页。

③（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九《溪田马光禄传》，《李开先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893页。

④《正德九年会试录》，第17页。

⑤林颖政：《明代春秋著述考》，台北：致知学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116页。

⑥（明）马之骏：《妙远堂全集》墓志《中宪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刘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4册影明天启七年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9页。

⑦《谭元春集》卷二十三《黄叶轩诗艺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9页。

《尚书》，最后以《尚书》中举。同时，王红春也指出士人在乡试中的本经与会试之本经也有不相同者。^①可见，乡试、会试的本经是可以不同的，由士子自己申报为准。不过一般情况下，士子不大会轻易变动自己的本经。在以下的考察中，更多的情况是：如果一个士子在乡试中的本经为《易》或《诗》或其他，基本上可以类推他在会试中的本经也应该是《易》或《诗》或其他，反之亦然。

与专经、本经的概念密切相关的，是笔者提出来的“地域专经”的概念。经学与地域的紧密衔接，汉代已然。明人姚镛（1465—1538）说：“以一家而专一经者，为戴氏之《礼记》；以一邑而专一经者，为燕、韩、赵之《诗》。”^②这说的是汉代经学的面貌。此处要谈的“地域专经”，是指明代要求考生参加科举考试须有本经的科举体制下，通常一个地域的士子会比较集中地选择以一到两种经典去应试，而且其地域通常以县为单位。在明代史料中，“安福《春秋》”“麻城《春秋》”“淳安《春秋》”“黄冈《礼记》”“余姚《礼记》”“山阳《礼记》”“无锡《尚书》”“莆田《尚书》”“祁门《春秋》”等各种各样的提法，实质上即指那些县的士子多以某种经应科举。浙江鄞县及福建晋江县的《易》、浙江慈溪县的《诗》，在明代地域专经中也很有名。有时候这种地域偶尔也会扩大到以府为单位，如明人提及严州府、福州府的《春秋》、临江府的《春秋》、金华府、苏州府的《易》等。但即使这种以府为地域范围的专经提法，也依然是建立在府下某些县擅长某种经典的基础上的。例如，严州府《春秋》实际上是以淳安县的《春秋》经肄习风气为依托，而福州府的《春秋》则是以闽县的《春秋》肄习风气为依托。因此，最明确、直接而且可以测算的地域专经单位还是在县一级地域。而且，地域专经在明代不是个案，而是很普遍的科举文化现象。

地域专经意指某一地域的士子更趋向于某种经典，但并不表示该地域的士子对于其他经典就毫无兴趣或毫无肄习的可能。也就是说，某一地域对于某种专经的趋尚，并不排斥该地仍然会有不少士子选择肄习其他经典。例如，淮安府山阳县以《礼记》闻名，但以《诗》为本经的亦不少。正德《淮安府志》卷十三载：“张毅，维扬人，侨居淮郡。博学多才，尤邃于《诗》。”受张毅等人的影响，山阳县以《诗经》获功名者不少，如沈翼、蒋琮等人。正德《淮安府志》卷十三载：“蒋琮，字润之，山阳人。少孤力学，以葩经承家，精富一时。及门者如布

^① 王红春：《明代进士家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第157页。

^② （明）姚镛：《东泉文集》卷一《送李生廷臣归河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6册影明嘉靖刻清修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68页。